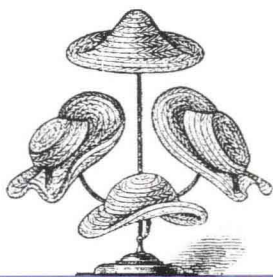


新知文库 阮炜 主编

培养人性

从古典学角度为通识教育改革辩护

[美] 玛莎·纳斯鲍姆 著 李 艳 译



Cultivating Humanity
A Classical Defense of Reform
in Liberal Education

上海三联书店

新知文库 阮炜 主编

培养人性

从古典学角度为通识教育改革辩护

[美] 玛莎·纳斯鲍姆 著 李 艳 译

Cultivating Humanity
A Classical Defense of Reform
in Liberal Education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培养人性:从古典学角度为通识教育改革辩护/(美)玛莎·
纳斯鲍姆著;李艳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4

(新知译丛)

ISBN 978-7-5426-4139-7

I. ①培… II. ①玛…②李… III. ①高等学校—教学
改革 IV. ①G64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7414 号

培养人性:从古典学角度为通识教育改革辩护

著 者/[美]玛莎·纳斯鲍姆

译 者/李 艳

责任编辑/黄 韬

装帧设计/豫 苏

监 制/李 敏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

网 址/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021-24175971

印 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640×960 1/16

字 数/320千字

印 张/24.25

书 号/ISBN 978-7-5426-4139-7/C·468

定 价/48.00元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510725

本书由深圳大学资助出版

Cultivating Humanity: A Classical Defense of Reform in Liberal Education
by Martha C. Nussbaum

Copyright © 1997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ia-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9-2009-780号

给瑞秋 (Rachel)

“大胆发表意见,而且是自己的意见”

(Aliquid et de duo profer)

做整全的人

——《培养人性》导读

阮 炜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当今大学人必须选择一个极其狭窄的研究领域，才能写出可供发表的文章，在学术界立足，拿到学位，晋升副教授或教授，搞到各级项目和大奖，尽管这些拿学位、升教授、挣大奖的文章只有极少数人能完全理解。并非人人都认识到了的一个事实是，日益细密的专业分工极具压迫性，它把个人视野和努力局限在一个极小的领域，结果是即便在分工极细的研究领域内部，从业者也不能理解彼此的工作。日益细密的专业化一方面使社会整体认识水平不断提高，一方面对个体生命构成了压制，而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有一种内在冲动，一种把多变为一，把杂多变为整全，把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变得可以把握的内在冲动。因了这冲动，人类上下求索探究自然和宇宙的奥秘，追寻生命和存在的意义，开出了现代文明，开出了诸如宗教、哲学、科学、政治学、经济学一类话语或理论。

当玛莎·纳斯鲍姆写作《培养人性：从古典学角度为通识教育改革辩护》一书时，她无疑受到了这种内在冲动的驱使。或者说，她要“培养”的人性其实就源自那种不要当单面人，而要做整全人的内心召唤。她一定知道，当今时代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是不可能全然取代职业教育

的。但她更清楚,如果不与这种戕害人性的现行教育理念作斗争,未来的情形会糟糕得多,麻木不仁、人而不人的职业人、单面人将铺天盖地,遍布地球。只有将通识教育的理念落实在大学的课程中,职业化教育的单面性才有望得到缓解,职业化教育的负面效应才可望得到哪怕是些许的冲淡。尽管受人类整体发展水平的制约,目前大学教育的职业化(在前沿研究领域,这已演变为专业方向的高度细密化)格局不可能得到根本改观,但如果能够开展文史哲通识教育,至少可望在专与博之间保持一种适度的紧张。充分开展大学通识教育,不仅可望使各领域、各专业的从业者做到由专而博、既专且博,更可能使人在广博知识的基础上达至一种整全的生命状态。此即通识教育的根本目的。

开展通识教育,意味着要在大学课程中系统地设置一套经典名著“核心课程”,并由一批学有所长的教师教授这些课程。对于纳斯鲍姆来说,这套课程如此关键,只有把它提到“培养人性”的高度,方能显出其极端重要性。这套课程不仅仅是为文、史、哲、语言学生开设的,更是为所有理、工、医、法、商等科学生开设的。在美国较为重要的大学中,这一理念多多少少已付诸实施,在《培养人性》中,我们甚至能看到有关通识教育的大量操作细节。在中国,在通识教育和核心课程一类理念是不是应该接受,如果接受又该如何实施的问题上,目前尚未形成共识。尽管如此,我们至少应当对经典名著究竟是什么,其中哪些著作或内容可纳入核心课程的范围展开讨论,并达成基本共识。我以为,某种简化详注的《论语》、《孟子》、《庄子》、《左传》和《史记》的一些精彩章节(具体哪些章节当然有待讨论),《红楼梦》和唐宋诗词各一百首,《圣经》、《理想国》和科学史等,应是所有重点大学本科生——无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还是医科、工科、农科、林科——必修课程中的一套必读书。

为什么是《论语》等等?答案很清楚:这些书是承载中华民族精神最重要的经典,里边包含着大量重要的信息,其中最重要的,又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真理,如仁、义、礼、智、信;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再如三人

行，必有我师焉等。千百年来，正是诸如《论语》一类文史哲经典使中国人成其为中国人。为什么还必须读《圣经》和《理想国》一类西方经典？因为此类经典代表了西方文明的两个源头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而一百多年来，西方文明又对中国文明产生的结构性影响人所共知。读了《圣经》和《理想国》一类书，学生们对西方精神形态就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当然，由什么老师来讲，怎么讲，也非常重要。

为什么是“简化、详注”的版本，而不是 1905 年废科举以前通行的全本？因为从可操作的角度来看，简化详注本更容易推广。更因为现代生活不同于古代生活，现代文明不同于古代文明，要完全读懂古代传下来的经典著作，准确地体悟其对现代人的意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如何简化、如何加注，这里边也有很大的学问，更可能因立场、观点的不同而侧重点不同甚至导向不同，所以学界应该有最起码的共识。

为什么所有大学生——包括理工科大学生——都必须学习世界科技史？这是因为受应试教育的负面影响，包括理工学生在内的许多中国大学生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狭窄的专业领域，不一定清楚甚至不在乎人类科技发展的来龙去脉，而科技在我们的生活又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几年前访学剑桥大学时，我和一群中国访问学者去威尔士首府卡迪夫参观一个古罗马石头碉堡。在碉堡的一个了望口前，一位理科学者说，罗马人正是从这里打枪，用望远镜观察敌情的！可是，作为热兵器的枪和望远镜是十四、十五世纪以后才发展起来的东西。古罗马不可能有枪，也不可能有望远镜。我基本上与理工人士不交往，却能遇到如此不了解科学史常识的科技人，可见科技从业者中缺乏起码的科学史常识者也并非罕见。）

为什么只在重点大学搞这种实验，这不是搞精英主义吗？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做务实派，除非根本不区分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不仅全世界都这么做，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搞平均主义的教育改革时，即便取消了考试，也没有取消重点与非重点大学的区别。必须承认，重点大学师资力量较强，学生的素质也较好。从社会的需

要即培养有全局眼光和深刻识见的人才来看,重点大学比之一般大学应该是当仁不让的。所以,如果要系统地推行通识教育理念,首先只可能在重点大学实验,然后才推广到其他大学。

但是,开出了一套含文史哲经典名著的通识课程,是不是专而不博或既不专又不博的问题立马就能迎刃而解?恐怕不这么简单。人类的知识决非静止不动。所以,要在学习领悟经典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阅读范围,了解近代以来人类知识的新发展,跟踪把握人类知识演进的最新动向;在当今这个多元文化、多元文明频繁互动的全球化时代,尤其要努力认识乃至熟悉西方人、印度人、阿拉伯人、伊朗人、非洲人以及世界上所有民族或文明的价值观和文化。这其实是当今时代任何希望培养自己人性,不要沦为单面人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都应该努力去做的事。当然,从长远看养成一种对待知识的正确态度,可能比开出一套核心课程更为重要。如果有这么一种新人类,虽然没有修过这些课程,却认识到经典极重要,甚至产生了一种非读不可的冲动,他们是随时可以去读的。这意味着任何人,无论朝气蓬勃的学生还是年届耄耋的老者,都应保持一颗开放的心灵,一种宽广的视野,一种对现实问题的批判精神。这正是开展通识教育并为此目的开设一套核心课程的根本目的。

2007年秋天,我在清华校园呆了两天,遇到一个清华学生,跟他聊起天来。他无比自豪地说,世界知名的风险投资银行每年在清华招十几个本科生,一去月薪便高达百万元以上人民币!我说,他们大概是“成功人士”中的“成功人士”;可是如果本科生毕业后一个月的收入便高过一个教授十年的工资,长此以往,清华大学还办得下去吗?他说,这是两回事:学生是学生,老师是老师;学生能做的事老师未必能做。我说风险投资银行的回报极高,但毕竟对社会分配体制也造成了极大冲击,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也许他是学工程或金融的,不认为他有反思此类问题的责任。他压根儿就没有看见问题。如今,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华尔街乃至全世界很多投资银行早已无事可做,无乱可捣,转业为商业银行了。不知那个清华

学生还那么牛气不。问题是，一个一流大学的学生为什么对现实问题缺乏批判精神？为什么他们全然想不到这一问题：毫无约束的资本主义正在把人类带向何方？此事发生在当代中国首倡通识教育和“大学理念”的清华大学。可见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一个人对社会、国家、人类要有关怀，或者说不可以把眼光局限在仅仅跟自己的利益直接相关的情事，而眼睛要看得见，心中要想得到更大的目标。这也是“培养人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一个人的兴趣点如果囿于个人、家庭、小集团，根本看不见或看见了却不去关心社会、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公正与和谐这样的大问题，就是没有全局眼光，其人格就不完整。这种人根本不是整全的人，而是单面人。所谓培养人性，所谓通识教育，其根本目的之一，就是要培养有全局眼光、全局关怀和深刻识见的人。

也许体育在美国不是问题，从小学到大学，体育活动都开展得很好，甚至存在着体育一美遮百丑的价值观，所以纳斯鲍姆在《培养人性》一书中几乎不讲体育。但在应试教育成风的中国，体育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即便我们已经成为奥运和亚运第一金牌大国，但全民体育运动开展得不好，却是不争的事实。众所周知，身体极其重要，是一切成功的基础。一个人只要能坚持适当的运动，便能保持良好的精神风貌。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运动使身体里各个部位的血管——尤其是心血管——保持舒张、畅通的状态，因而四肢和大脑所得到的氧气和营养供应比不运动的人要充足得多；运动也使身体里边的神经组织——包括脑神经组织——得到更多的营养，使其保持更好的状态。所以，常常运动的人看上去不仅身体状况比一般人好，而且精神状况也比一般人好。可是，同样由于分数至上主义的恶劣影响，中国人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都不重视体育。教育部门并不是没有规定体育课为必修，至少大多数大学在大二以前，体育学分是必修的。但是为什么同发达国家的学生比较起来，中国学生的体格明显较差？推而广之，为什么整个中华民族体格明显偏弱？我以为，中国人

身体瘦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人或中国社会太功利,并非真正喜欢体育。我们做一件事,通常并不看喜欢不喜欢,是否真正感兴趣,而是看有用没用。学生上体育课,并不是因为喜爱体育,而是因为要升学,要拿学分。如果我们到发达国家走一遭,会发现那里的人们参加体育活动,大多是出于真正的爱好,至少是出于强身健体的考虑,而非出于挣学分、升学这样的功利考虑。这至少是他们的全民健身运动明显强于中国的一个极重要的原因。所以,人性的培养必须包含体育精神的培养。不仅如此,每个人都应当活到老,运动到老。因为有了健全的体魄,才会有健全的心智。没有健全的体魄,没有健全的心智,便没有整全的人,只有病人。

要培养整全的人,美育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还得持之以衡地开展音乐和艺术方面的教育。大概美育在美国也不是问题,《培养人性》一书并没有专门加以讨论。但在应试教育重压下的中国,美育开展得不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除非你以音乐和艺术为专业,大家并不认为音乐艺术是每个人都该好好学习的,因为影响一个人一生的中考、高考和研究生考试并不考音乐艺术。但我们知道,优美的曲调直击灵魂,漂亮的画作赏心悦目。为什么?爱美是人性。为什么即便在原始部落,人们都如此喜欢唱歌跳舞,如此善于唱歌跳舞?为什么几万年前的原始人便已在岩石上做画涂鸦?显然,爱美也是人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人类进化到 21 世纪,在音乐方面已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从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到拉赫马尼诺夫、肖斯塔科维奇,再到华彦钧、陈刚,人类创造出了这么多美好的音乐,中国的大学生里边可能只有很少人能够真正欣赏,很多人连这些伟大音乐家的名字也不留意。但大学生却人人都能欣赏甚至演唱流行音乐。流行歌手和歌曲走马灯似地换个不停,你方唱罢我登场,不可能有真正伟大的音乐家或真正有价值的作品传世。不是不能听流行音乐,但如果只能欣赏流行音乐,根本不关注、不欣赏经典音乐,或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传统音乐,岂不是绝大的悲哀?爱美是人性,而爱美的天性在这个国家遭到如此严重的压制,不说是在全世界数一数二,至少也是“名列前茅”。为什么

美国华裔学生在音乐和美术方面个个都那么出类拔萃,明显高出其他种族?这只能说明,中国人是一个有艺术天赋的民族;这种天赋在国内被不合理的应试教育压抑了,得不到开掘,隐而不显,而在国外却有机会表现出来。所以,富于人性的通识教育也应包括美育在内。即便把音乐史和音乐名作欣赏、美术史和名画名雕塑欣赏之类的课程列为必修,至少也应该列为重要的选修课,并向所有的本科生、研究生甚至博士生强烈推荐这些课程。音乐和艺术潜力得不到开掘,我们的生命必有严重缺陷。

深圳大学有艺术系,近年来也对全校学生开了一些音乐和美术方面的选修课,还时常举办师生音乐会,也请校外音乐团体进校演出。北京大学一直有艺术教研室、艺术系,2006年4月成立了艺术学院。现在,北大艺术学院对全校学生开音乐美术方面的课程,效果应该很不错。我2002年在北大英语系工作了一个学期,发现北大学子的音乐知识和音乐欣赏水平明显高出一般高校。这与北大学生悟性较好有关,也与当时已有艺术系有关,也与有百年大讲堂一类设施有关。中山大学没有艺术系,但在传播学院下面设了一个艺术设计系。据说该系并不对全校学生开美术欣赏课;至少从名字上看,也不大可能对全校开音乐课程。其实,中国较好一点的文理科综合性大学都应该有艺术系或艺术学院,不然人性所赋予的艺术基因就浪费了。当然,广州有星海音乐学院,还有美术学院,一定程度上可弥补中山大学的不足。为什么不把它们合并到中山大学?资源整合可以更好地利用资源,不仅原中山大学学生能大大受益,音乐和美术专业的师生也能更方便接受人文知识的熏陶,提高综合人文素,从而更好地培养自己的“人性”。我以为这样做,至少可以收到这种效果:使音乐和美术专业的从业者较少受专业化的戕害,或更好地培养他们的人性,使他们免于沦为乐工、画匠。

最后但却最重要的一个议题,是人文学科与商科、法科、医科等的关系问题。这里的“人文学科”不是“文科”,而是文史哲和语言。在中国,人文学科与理、工、农、医学科的区别很明显,与商、法、管理的区别却并非十

分明显。这是因为文史哲和法商管理类学科统统被归为“大文科”的范畴。从世界范围来看,似乎还没有另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把知识笼统地划分为文科和理工农医等科。人文学就是人文学,与经济学、金融贸易、法学和管理学关系不大,不能把它们笼统地称为“文科”。在西方语言里,人文学是 humanities,确切地说,就是哲学、历史、文学和语言。在精神品质上,人文学科可能与物理、化学、数学和生物学等基础学科更为接近,而与经济学、金融贸易学、法学、管理学、工程学却相隔甚远。在哈佛大学,文理学院与法学院、商学院和政府管理学院等并立,这是因为哈佛的学者和管理者们认为文史哲和数理化都是非实用型学科,或者说都是偏重纯粹知识的基础学科,应当归为一类,而经济学、法学、金融学等却是实用型学科,即马上能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的学科。即便实用学科也有发达的理论体系,其理论却为的是不同的目的,是直接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与文史哲理论有很大的不同。总的说来,实用学科属于职业教育的范畴,更侧重培养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而非培养传承和创造纯粹知识的人。

当然,从根本上讲文史哲学科也是要解决社会问题的,或者说也有其社会目的,不然它们有什么益处?但它们的目的和所要解决的问题却不像商科、法科、管理学科和工程技术学科那么直接,或者说不那么“实际”。准确地说,文史哲更多是回答和解决价值观或精神上的问题。当今世界越来越实用主义,越来越功利主义,人文学科的空间越来越受到挤压。在中国的大学,文史哲受实用学科挤压尤其严重。现在文史哲学生难以找到“好”工作就说明了这一点。更糟糕的是,现在很多大学都用有没有项目甚至项目经费多寡来评估人文学者的业务表现。这种做法很有问题,甚至是恶劣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从性质上看,文史哲学术成果不可能量化,也不应量化,更不应用有没有项目或者项目经费多寡来进行量化。试问,古今中外哪个文史哲学大家是靠拿项目奠定了其学科地位的?罗素、理查兹、汤因比和雅斯贝斯一类人,有谁是靠拿项目才把学问做出

来的？再看中国，梁启超、胡适、鲁迅、毛泽东、梁漱溟、熊十力等一大批对中国人精神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文学者和思想家，有谁是靠拿项目把学问做出来的？幸好当时不搞项目，不然当今中国不知是何模样。

但恰恰是人文学科最能体现通识教育的根本旨趣——培养人性。发达国家的重点大学为什么要求所有本科生——无论他们学哲学、历史和文学，还是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和生命科学，无论学经济学、金融贸易学、法学、管理学，还是工程技术、农学或医学，都必须读从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西塞罗和维吉尔等古人的作品？这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是文史哲经典，更因为这些作品承载着西方人的精神传统，承载着西方人的价值观念，使西方人成其为西方人，更能使无数出身一般的个人能最终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中国的大学人尤其是管理部门的大学人应该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了。千万不要对人文学科搞项目至上和量化管理。中国大学在关注（在很多情况下是过分关注）实用学科的同时，应当像发达国家那样尊重人文学科的内在规律，尽量给它们多留空间。

人文学科若能享有一种宽松的氛围，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便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大学——尤其是综合性重点大学——在几十年至一百年内便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一流大学，便能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整全的人，而非沦为批量生产单面人的大型工场或培训班。也唯有如此，中国人的人性方能不被压抑，而是得到张扬。

序

ix

这本书源自我二十多年来在哈佛、布朗和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经历,以及作为访问学者和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协会(Phi Beta Kappa)访问教授到美国十多所院校的访问。其间,我走访了十所院校,每一所院校待三天,给老师和学生上公开课,并有若干非正式的办公时间。除此之外,还讲授三四堂本科生的课(要么是哲学课,要么是古典学)。哲学研究委员会也有一个由美国人文基金会提供资金的类似项目,我经常参与其中。这两个项目都是为了让演讲者可以访问各个院校,否则他们自己无力负担这样的访问。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把自己的经历跟书本上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进行比较;我常常觉得书上的内容没有正确地反映出我们大学院校的总体状况。我开始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和《新共和国》(*New Republic*)上发表评论,表达不满。

我过去和现在所采取的办法都是从哲学入手。我想要论辩一种特定的公民身份,因此提出教育方面的建议。但是,哲学不应该超脱于真实生活之外,因此,我在提出建议之前必须先对美国大学院校当前的发展状况有所了解。由于大众可能已经对这些状况有一种深入人心的认识,这种认识不太完整,甚至还可能造成严重的误导,因此更加有必要对大学院校进行体验和了解。另外,需要强调美国学生和院校的多样性,这一点似乎也很重要,这样才能使提议不那么抽象并且有所用处。这个项目中不会

x 试图进行数据调查,也不需要这种调查,且不会提供数据来说明有多少大学的英语课程研究莎士比亚,或者有多少院校开设孟加拉语和印度语课程。但是,要求对各种不同的院校进行丰富充实的描述,这些不同院校为了让课程有所变化而付出努力,这对于这些从哲学着手的提议来说,不仅是有用的例证也是其依据。绝大多数有关高等教育的书籍把自己局限于少数几所著名的精英学府,或是来自其他一些院校的几则趣闻轶事。我想要表达的是在不同院校生活的感受,让读者能清楚地思考正在发生的变化。

为了更系统地了解美国的高等教育,也为了要撰写这本书,我起初挑选了十五所能代表美国各种不同学校的“核心”院校进行详细的研究。我偏向于自己待过的那些院校。我在每一所院校挑选一名主要的联系人,我很了解并且可以信任此人(这通常意味着此人来自哲学或古典学或政治理论等领域)。除了一所院校之外,其他所有院校的联系人均均为该校的教师,邀请联系人撰写一篇报告,阐述该校如何纳入新的教育方式,并把其他人的姓名和打印材料寄给我,协助我或我的研究助手访问该校。事情并不能总是精确地按计划进行,这一点不可避免。有些院校的报告比其他院校要具体一些;有些院校最初“提供消息的人”什么都没写,但是我遇到的其他人则填补了这一空白。有时,其他院校就有关课程的倡议引起我的兴趣,甚至改变我最初的选择。例如,尽管我访问过圣劳伦斯大学,可是在开始这项工作之初,我并不了解该校的课程。我在所有院校都竭力倾听不同意见,跟老师和学生进行沟通。

在整个项目过程中,四位研究助手对我的帮助不可估量。由于他们在此书中发挥了作用——尤其是到多所校园进行访问的那两位助手——读者应该对他们有所了解。布朗大学古典学系的研究生萨姆·豪泽(Sam Houser,目前即将完成有关斯多葛学派思想的博士论文),负责收集业已出版的材料,撰写了十几封询问的信件,并且在这项工作开始的头六个月整理我的文件。埃里克·科宁博格(Eric Klinenberg)于1993—

1994 年间替我工作,当时他刚刚从布朗大学获得美国文明专业的文学学士学位,目前是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社会学的博士生。他代表我前往墨哈斯学院(Morehouse)、斯贝曼学院(Spelman)和贝尔蒙特大学(Belmont)访问,收集材料。他先去贝尔蒙特——一所位于纳什维尔的保守派浸礼会院校,第二天又去墨哈斯和斯贝曼。他在这两个院校跨越了宗教、文化和种族的障碍,激发起大家的信心,对于一位在芝加哥长大、在布朗大学受教育的犹太人来说,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当我听完他录下的好几个小时的访问内容时,觉得他既聪明又机智,工作完成得很好。雅思敏·达利瑟(Yasmin Dalisay)1994 年春天和夏天替我工作,先后前往加州大学湖滨分校、杨百翰大学(BYU)以及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Reno)。雅思敏的父母都是菲律宾裔的医生,他们刚到美国不久就到犹他州的奥勒姆(Orem)工作,离普若佛(Provo)不远,杨百翰大学就坐落在那里。他们之前不了解摩门教。雅思敏从小是一个自由主义的跨文化移民,生活的社区极为保守。她对摩门教有深入了解,也尊重该教的传统(尽管带有批判性),这使她不仅可以在校园(绝大多数布朗的学生都觉得在这里很自在),而且也能够对那些地区进行研究性的访问。雅思敏于 1996 年从布朗大学哲学专业毕业。在准备手稿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我的研究助手是罗斯·戴维斯(Ross Davies)。他是芝加哥大学法律系的学生,1996—1997 年间是《芝加哥大学法律评论》的主编;他还将于 1997—1998 年间担任美国第七巡回上诉法院黛安·伍德(Diane Wood)法官的书记员。

在整个过程中,所有的受访者都知道我这个项目的性质;他们同意接受采访,内容被录音以及被引用。书中绝大部分学生的名字是真实的,也有少数几个学生用的是假名。

我要感谢很多人,他们帮助我完成这本书的构思和撰写工作,首先要感谢四位优秀的编辑。《纽约书评》的罗伯特·西尔弗斯(Robert Silvers),他于 1987 年邀请我对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的《美国心灵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发表评论,这是整件事